

〔宋〕柳永 著 李之亮 注评

柳永词选

国学经典

〔宋〕柳永 著

柳永词选

李之亮 注评

中州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柳永词选/(宋)柳永著;李之亮注评.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2011. 10
(国学经典)
ISBN 978-7-5348-3687-9

I. ①柳… II. ①柳…②李… III. ①宋词—选集
IV. ①I222.8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10317 号

出版社:中州古籍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发行单位: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河南大美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640mm×960mm 1/16 **印张:**14.75

字数:190 千字 **印数:**1-5000 册

版次: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柳永词选

前 言

柳永原名柳三变，字景庄。后改名永，字耆卿。因排行第七，人称“柳七”，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市）人。因为他一生官职卑微，《宋史》、《东都事略》都没有给他立传，连清人陆心源作的《宋史翼》都没有关注到此人，所以关于他的生卒年，便成了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一直作为大学文科教材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11月版）说他约生于987年（宋太宗雍熙四年），约卒于1053年（宋仁宗皇祐五年）。如果此说大致符合史实，柳永大概活了六十六七岁，在那个时代，算是得终天年了。何况他的《望海潮·东南形胜》、《早梅芳·海霞红》等词若真是投献给孙沔的，那么他至少应该活到嘉祐元年（1056），到了“古来稀”的年龄。他父亲叫柳宜，五代十国时曾为官于南唐，入宋后，终官工部侍郎。柳宜共有三个儿子，老大名叫三复，老二名叫三接，三变是柳宜最小的儿子。柳永虽然是福建人，但从小跟着父亲在北方长大，所以广义来说，他算是个北方人。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三说他“为举子时，多游狭邪，善为歌辞。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这说明柳永年轻时，音乐造诣就已经很高，以至在教坊乐工那里都挂了号，用现在的话说，他年轻时就是“大腕儿”级人物。此人聪明绝顶，对词曲乐律又有着

先天的敏感和超乎寻常的造诣，所以很快在这方面走红，也在情理之中。

柳永是北宋第一位大量创作词的人。翻开唐圭璋辑的《全宋词》可以发现，在柳永之前或同时期写词的人本身就很少（17人），每个人留下的作品多则四首（寇准、范仲淹），少则一首，都算不上“词人”。从这一点上说，柳永在宋词的创作和发展史上，起到了倡扬和推动的重要作用。“词”的起源，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个概念。广义的词最早可以追溯到《诗经》。因为《诗经》中的“国风”部分，实际上就是些民间歌曲，是老百姓自吟自唱抒发情感的民歌小调儿。狭义的“词”，则可以追溯到唐朝。我们可以发现，唐代不少诗人，一旦与底层百姓融合在一起，很自然地会被当时当地的民间歌曲所吸引，创作出有别于“诗”的、更贴近百姓情感和生活的“俚曲”，李白的《菩萨蛮》、白居易的《忆江南》、刘禹锡的《竹枝词》等，至今依旧脍炙人口。这些作品之所以能流传至今，一是由于这些作者本身都是大名鼎鼎的大诗人，“人要文传，文要人传”，所以能拥有最庞大的读者群，同时也拥有代代相传的声望基础。实际上，唐代的“词”决不仅仅是这么几首，翻开崔令钦的《教坊记》，可以发现当时教坊中的“词”已经达到三百二十五种之多，宋词中很多常见词牌，早在唐代就在教坊中广泛地使用和演唱了。举例来看，《乌夜啼》、《浣溪沙》、《西江月》、《虞美人》、《菩萨蛮》、《临江仙》、《木兰花》、《诉衷情》、《苏幕遮》、《生查子》、《南乡子》、《雨霖铃》、《河满子》、《洞仙歌》、《浪淘沙》、《清平乐》等，都不是宋朝人的创造，只是宋朝人的继承而已。由于这些词当时只在宫廷或很小范围内演唱，没有形成普遍而广泛的文化现象，所以随着唐末长期的战乱而黯然退出文学和音乐的舞台，以致很多人误以为“词”的“专利”属于宋朝，这实在是唐代词曲家们的极大悲哀。其实五代时期南唐李璟、李煜二主，

都是填词的高手；后蜀的一些大臣，也留下了相当数量的词作，这足以说明，唐代的词历经五代，并没有彻底断绝，北宋中期开始大量出现词人，直到南宋之末依旧不衰，于是形成了一代文学的标签式体裁。

五代本身就有五个朝代（梁、唐、晋、汉、周），再加上十余个“偏国”，为什么只有南唐和后蜀两国君臣对填词情有独钟呢？这和“词”本身的特点密切相关，换言之，“词”所歌咏的，大多是人们的切身生活感受。从南北朝以来，宫廷中的“生活”无非是君王与嫔妃之间的男欢女爱，民间的“生活”则必须有读书人的参与才能形成“词”。而集读书人与“民”为一体的地方，莫过于秦楼楚馆，所以“词”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作为一种享乐消遣的载体，承载的也大多是士子们享乐消遣时所产生的种种情感。可以说，“词”的兴盛，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国力相对富足，国势相对稳定，君臣大多安于富足和享乐；二是有一批卓有文采的士子投身其中参与创作。五代十国时期能满足这两个条件的国家，只有南唐和后蜀。为什么宋朝前期“词”的创作尚显萧条呢？这不难解释，一是因为北宋开国的最初几十年，一直处在南征北讨收复偏国的半战争状态和稳定中央政权的政治斗争氛围；二是因为北宋确立了文人治国的基本国策，读书人不再仅充当权门花草，而是担当起强国富民重任的社会主角。宋朝初期的士子，大都能以天下为己任，所思所想，都是苍生社稷的大事。那时的读书人如果仅以闲情逸致为最高境界和准则，会遭到朝廷乃至大多数士子的蔑视，所以尽管北宋初期李煜、孟昶及其属下把“词”带到了中原，却并没有在短时期内成为文学创作的主要形式。这就不难理解柳永的出现并走红，正是宋朝初现升平气象，进而与北方强敌契丹签订了“澶渊之盟”之后，真宗大事封禅以粉饰太平，宋朝历史上最仁义的帝王仁宗在位的那段时间。国家走上正轨，朝野一片祥和，歌咏升平气象已经

成了读书人写作的基调。于是柳永、张先、晏殊率先沉迷于词的创作，欧阳修等继其后，北宋词的创作才慢慢繁荣起来。

对柳永词的评论，历来有很多不同的声音，甚至在当朝，就有批评和肯定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持批评态度的为首者是宋仁宗。《诗话总龟》后集卷三十二引《艺苑雌黄》说：“（柳）永字耆卿。喜作小词，然薄于操行。当时有荐其才者，上曰：‘得非填词柳三变乎？’曰：‘然。’上曰：‘且去填词。’由是不得志，日与儇子纵游倡馆酒楼间，无复检率，自称云‘奉圣旨填词柳三变’。乌乎，小有才而无德以将之，亦士君子之所宜戒也。”皇帝带头不待见他，批评他的人自然不在少数。但也有很喜欢柳词的，如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引晁补之语云：“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如《八声甘州》云：‘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此真唐人语，不减高处矣。”（按：此语当是苏轼所说，见本人所著《苏轼文集编年笺注》卷七五）张端义《贵耳集》引项平斋的话说：“诗当学杜诗，词当学柳词。杜诗、柳词皆无表德，只是直说。”此人甚至把柳词与杜诗相提并论了。《魏庆之词话》引李清照的话说：“逮至本朝，礼乐文武大备，又涵养百年，始有柳屯田永者，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既然是“大得声称于世”，足以说明当时喜欢柳词的人是何等之多，乃至当时有“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的说法。《贵耳集》又说：“盖词本管弦冶荡之音，而永所作，旖旎近情，故使人易入。虽颇以俗为病，然好之者，终不绝也。”可见当时的世态之下，柳词是很受人追捧的。客观地说，张端义的话说到了根本上：词原本就是“管弦冶荡之音”，柳永的词恰恰最符合这个“标准”，难怪有那么多人喜欢。到了后世，不少评论者都喜欢拿他的词与苏轼、周邦彦、李清照等人的词相比，进而得出“俗”、“艳”等结论。这样的看法没有太多可辩驳的，只是文学评论者应该把眼光放得更宽些，或者说应该把柳词放在真

宗末、仁宗初那个大背景下去评论，也许会更客观些。依我看，柳词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有话直说。柳永用毫无遮拦的言语和词作，把自己的性情和心思和盘托出，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真实的柳永。他狂放不羁，举止行为不够检点，喜欢美女，对床帏之事也津津乐道。他完全可以还是那个柳永，唯独不写词，那样的话，大概上自仁宗，下到历代评论家，都不会把他看得如此不堪。宋朝是个相对尊重人性的朝代，士子与妓女交往，不但不会受到非议，反而被看成是风流韵事。我们熟悉的宋朝名人，几乎没有一个不与妓女往来甚密。《钱氏私志》载：欧阳修任河南推官时亲近一妓。时河南留守钱惟演设宴，官员们都已到位，唯“欧与妓俱不至，移时方来”，于是发生了后面不少故事。宋朝还有蓄养家妓的风气，这些妓女在地位上与其他妓女并无二致，不同的是，她们只服务于一个主人。当主人不再需要她们时，可以随意将她们转让或遣散。比如苏轼“乌台诗案”连累了王巩，王巩被贬谪到广南宾州（今广西宾州）。苏轼在给他的信中写道：“粉白黛绿者，俱是火宅中狐狸、射干之流，愿深以道眼看破。”意在劝王巩远离妓女，不要多养家妓，那都是些“狐狸精”，会把贵体淘空的！（见拙著《苏轼文集编年笺注》卷五十二）苏轼本人在杭州所收的小女朝云，当时才十二三岁，是个歌妓。只因后来她给苏轼生了儿子苏遁，才被主人“破格提升”为妾，而苏轼南迁时，除了带上朝云，其余家妓都遣散了。狎妓在宋朝本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更谈不上道德品质问题，在宋朝，比柳永“花”得多的人比比皆是，为什么唯独柳永受到当时、后世人们的纷纷诟病？根本原因是因为他那支破笔没好好用在求取功名上。如果他再虚伪一点儿，内敛一点儿，对狎妓的事不那么津津乐道，啥毛病都没了。

二、善于铺排。这本小书所选的不少篇柳词，都明显地体现出

这一特色。由于本人已经在具体词章的“评析”部分都做了相应的分析，这里仅举一例，供读者体会。《竹马子·登孤垒荒凉》词：“登孤垒荒凉，危亭旷望，静临烟渚。对雌霓挂雨，雄风拂槛，微收烦暑。渐觉一叶惊秋，残蝉噪晚，素商时序。览景想前欢，指神京，非雾非烟深处。 向此成追感，新愁易积，故人难聚。凭高尽日凝伫。赢得消魂无语。极目霁霭霏微，暝鸦零乱，萧索江城暮。南楼画角，又送残阳去。”这是一首描写羁旅行愁的词。上阕从荒凉的孤垒、平静的烟渚、高挂的虹霓、拂槛的秋风，一直写到聒噪的鸣蝉，极力铺排自夏入秋的种种景致，直到最后一句，作者才点破主题：原来是触景生情，想起了远在京城的佳丽。下阕直抒愁怀。由于“新愁易积，故人难聚”，所以尽管终日伫立，也不可能解开满怀的愁思。至于众所周知的《望海潮·东南形胜》，把个杭州美景铺排得淋漓尽致。似此之类，不但能调动读者的阅读意愿，还能给读者一种深沉凝重、丰富多彩的艺术感觉。这堪称是柳词一绝，其后很多作者从他的词中受到启发，才最终蔚成风气。甚至出现了“七宝楼台”和“清空”等不同的风格。广义来看，其实都是铺排，不同的是如何铺排才更加别致。

三、多用俗语。柳词中相当一部分都属于市井词，而不能算是文人词，故而他的词中大量使用当时的俗语，这也是“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很重要的原因之一。他很懂得，词就是俚俗小唱，属于俗文学范畴，只要合于音律，词语应该是越浅近越好——卖弄才学，不应该在这上头。如果我们留意的话，可以发现，无论是白居易的《忆江南》，还是刘禹锡的《竹枝词》，用语都明白如话，接近于当时的口语。在这一方面，柳词实际上是忠实继承了词的固有传统。像“趁”、“恁”、“都”、“伊”、“刚”、“怎生”、“甚么”、“人人”、“孤负”、“争奈”等，均不是传统文言中使用的词语。这些当时人们经常说到的“土词儿”，并没有减弱柳词的文学

性，反而更加接近一般人的欣赏水平，尤其是他接触甚多的妓女，哪里有多少“文化”水儿？指望她们学富五车，那可能吗？当然，在写给某些达官显贵的投献词或赠别词中，他也毫不示弱，成串的典故信手拈来。本书所选的数首投献赠别词，就属于这一类，读者自可欣赏。

由于柳永仕途蹭蹬，做人又颇为“另类”，史籍中关于他的生平记载十分欠缺。在很长时间里，人们更多关注的是他的词本身，对于他的仕履、交游甚至生卒年都很少在意。清代词学研究兴起之后（因为“词”属于俗文学，很长时间里不能进入传统文人研究的视野），人们才对这位词人进行了越来越深入的研究。到今天为止，对柳永方方面面的研究逐渐多起来。他的词集《乐章集》也有学者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整理笺注。其论文数量，在宋代词人中也算比较多的。如果有读者喜欢更多地了解柳永的传奇一生，这些论文论著都可以参考。不过我在这里还是想说几句扫兴话，就我见到的部分关于柳永的论文论著，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瑕疵和不尽人意之处，这些问题大多集中在对人物的考证失当和对当时典章制度的理解偏差上。当此小书交稿之际，略举数例，以证研究古籍之艰难。中华书局出版的《乐章集校注》一书，是迄今为止最为成形的古籍整理著作。能看出作者是花费了很大工夫的。其间也不乏真知灼见，比如在柳永卒年的考证上，对以唐圭璋为代表的说法（卒于皇祐五年前后）进行了反驳，认为柳永不可能那么早就去世。我同意柳永不卒于皇祐五年的说法，但也不同意该书作者把柳永的卒年下推到嘉祐三年之后。作者薛瑞生先生认为，《临江仙·鸣珂碎撼都门晓》一词是投献给扬州知州刘敞的。其主要根据是词中有“荆王魂梦”四字，并认为此“荆王”乃西汉荆王刘贾，而非楚顷襄王，于是得出结论，认为此词的被投献者必是“姓刘而又有知扬仕履者”。进而推断此人为嘉祐三年扬州知州刘敞，再进而得出柳永或

卒于嘉祐三年之后，对唐圭璋所论柳永卒于皇祐五年之说提出质疑。实际上，此种考据过于拘泥，“荆王魂梦”就是宋玉所谓“楚顷襄王梦巫山神女”之事，薛先生把弯子绕得太大了。据本人考证分析，此扬州知州乃是盛度，词的写作时间在宝元二年（1039）年末。具体的论证，请读者参读本书此词的“评析”部分。还有一首《如鱼水·轻霭浮空》词，薛先生考据认为是投献给吕夷简的作品，这就更加令人无法苟同。糟糕的是，由于作者认为所投献者为吕夷简，进而生硬地把吕夷简确定在颍州，又确定柳永曾经去过颍州，这就形成了“链条式”的非单一性错误。像柳永这样的无名鼠辈，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与当时的权相吕夷简拉上关系。（具体请看该词“评析”部分）《乐章集校注》中投献词究竟投献给何人这一点上，问题是很多的。但因此书印量较大，以之为据生发出来的一些论文论著，则往往以讹传讹，越说越离谱儿。本书将柳永投献词悉数收录并加以剖析辨正，目的之一也是希望对《乐章集校注》中的问题加以廓清。再如刘天文所撰《柳永年谱稿》，称柳永曾到过成都，大概也是受了《乐章集校注》的影响。实际上，《一寸金·井络天开》词仅仅是一首送行词，并不能证明柳永写了一首送成都知府的词，就断定他当时一定待在成都。如果照此理论，那么范仲淹写《岳阳楼记》也必须亲自到岳州去实地“体验生活”了？古人送行词写所送之人抵达之地的景物是寻常之事，况且成都这样的繁华都市，那点历史典故对于当时的读书人来说，根本算不得什么学问。我们理解古人，如此拘泥，实际上是贬低了古人的智商。又如吴熊和所撰《从宋代官制考证柳永的生平仕履》一文，出发点是很高明的，但其中的一些说法，也存在问题。文中说：“《宋故郎中柳公墓志》谓柳永改官后，‘召见仁庙’，‘授西京灵台令’……宋时西京所属实无灵台县。《元丰九域志》卷一西京河南府河南郡，所属河南、永安、偃师、巩、登封、密、新安、澠池、永宁、长水、寿

安、伊阳、河清等十三个县，内中并无灵台县……《元丰九域志》卷三陕西路华阴郡，下属郑、下邳、蒲城、华阴、渭南五县。华阴与渭南二县相邻，一东一西。渭南县下有注曰：‘有灵台山。’故或可以‘灵台’代称渭南。《宋故郎中柳公墓志》谓柳永‘授西京灵台令’，‘西京’乃依汉唐旧称，实指长安；而‘灵台令’，其或指柳永尝宰渭南、华阴欤？”吴先生绕了这么大的一个圈子，甚至不惜让宋朝的西京洛阳硬性回到汉、唐时的西京长安，实在是讲不通的。实际上吴先生把“灵台”理解错了。《宋史·职官志》中有“灵台郎”一职，乃是负责天文历象的小业务官，“灵台令”实即“灵台郎”，与“县”的概念马牛其风。宋代西京河南府的官位设置与东京开封府大致相仿，故西京亦设灵台之官。此可谓一念之错，谬之千里。以上所说，并没有否定学者孜孜研究的甘苦，只是想说明，宋代文学的研究，不少论文论著都存在着类似的问题。就连最权威的大学文科教材《中国文学史》，在谈到词人张先的仕履时，都不免出现张先曾担任“开封府通判”这样的错误，究其原因，是因为编者误将“京兆府”理解成了开封府。实际上，宋朝的京兆府还是指西北的长安（今陕西西安）。且宋朝中等以上的州府都设通判，唯独开封府不设此官。关于这一点，编者大概也不清楚。宋朝的典章制度非常复杂，我们研读宋朝文献，实在需要慎之又慎才是。

柳永的词现存二百一十多首，我们选取了其中的一百四十五首，已是全集之大半，应该涵盖了柳词各类题材的作品。这个选本主要依据中华书局出版的《全宋词》，也参考了部分今人的论述。中州古籍出版社在其“国学经典”丛书中选入这部《柳永词选》，我认为是有见地的。出版者深知，尽管柳永其人的历史评价毁誉参半，但他是宋朝词史上具有开辟之功的先驱作者，仅就这一点，将其词列入“国学经典”就不为不妥。编辑室主任卢欣欣女士向我

约稿时，我二话没说便答应了。这并不说明我对柳永有多深的研究，而是出于对该社的敬意，赧然从命而已。为了便于读者阅读，我在难字后面都加了注音。编校过程中，责任编辑闵世勇同志提出了不少有益的建议，在此一并表示感谢。书中注释与评析难免有不妥或谬误之处，诚恳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李之亮

2011年5月15日

目 录

黄莺儿(园林晴昼春谁主)	19
玉女摇仙佩(佳人)	20
雪梅香(景萧索)	22
尾犯(夜雨滴空阶)	24
早梅芳(海霞红)	25
斗百花(飒飒霜飘鸳瓦)	28
斗百花(脸色韶光明媚)	30
斗百花(满宫腰纤细)	32
甘草子(秋暮)	33
甘草子(秋尽)	34
送征衣(过韶阳)	35
昼夜乐(洞房记得初相遇)	38
昼夜乐(秀香家住桃花径)	39
柳腰轻(英英妙舞腰肢软)	40
西江月(凤额绣帘高卷)	42
笛家弄(花发西园)	43
倾杯乐(皓月初圆)	45

迎新春(懈管变青律)	47
曲玉管(陇首云飞)	49
满朝欢(花隔铜壶)	50
梦还京(夜来匆匆饮散)	52
凤衔杯(有美瑶卿能染翰)	53
凤衔杯(追悔当初孤深愿)	54
鹤冲天(闲窗漏永)	55
受恩深(雅致装庭宇)	57
看花回(屈指劳生百岁期)	58
看花回(玉城金阶舞舜干)	59
柳初新(东郊向晓星杓亚)	61
两同心(嫩脸修蛾)	63
两同心(伫立东风)	64
女冠子(断云残雨)	65
金蕉叶(厌厌夜饮平阳第)	66
惜春郎(玉肌琼艳新妆饰)	67
雨霖铃(寒蝉凄切)	68
定风波(伫立长堤)	69
尉迟杯(宠佳丽)	70
慢卷绸(闲窗烛暗)	72
征部乐(雅欢幽会)	73
佳人醉(暮景萧萧雨霁)	74
迷仙引(才过笄年)	75
御街行(前时小饮春庭院)	76
归朝欢(别岸扁舟三两只)	77
采莲令(月华收)	78